

近现代阿拉伯文论概貌

孟昭毅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3)

摘要:从19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的文学和文论在普遍展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埃及、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和文论,开始呈现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阿拉伯文坛,先后兴起的埃及“笛旺派”和由黎巴嫩、叙利亚等在美洲的侨民组成的“旅美派”等文学流派,他们不仅在文学上硕果累累,而且在文论上也对文学的本质和美学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指导意义的理论阐述。这不仅保证了近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以后的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阿拉伯文论;笛旺派;旅美派;埃及文论

中图分类号:I 37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951(2005)01-0018-05

近现代阿拉伯地区由于西方列强的争夺,曾先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西方文化的渗透,客观上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先进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并成为阿拉伯文化文学发展的借鉴。从19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的文学和文论在普遍展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埃及、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和文论,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阿拉伯文坛,先后兴起的埃及“笛旺派”和由黎巴嫩、叙利亚等在美洲的侨民作家组成的“旅美派”等文学流派,他们不仅在文学上硕果累累,而且在文论上也对文学的本质和美学等问题提出了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阐述。这不仅保证了近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以后的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拉斐仪(1880—1938)是埃及近现代较早的文学

评论家,其文论著作主要有《在〈古兰经〉的旗帜下》(1926)、《月谈集》(1936)、《笔的启示》(1936)等。他坚信阿拉伯语言文学遗产的价值,坚信阿拉伯文艺复兴必须以阿拉伯标准文学语言为基础,主张文学应该把人间之美体现出来,把生活的意义提高一步。他认为作家的责任是阐述哲理,澄清是非,消除动荡和混乱,以其思想架起精神世界与生活之间的桥梁。他宣称阿拉伯文学可以容纳一切新事物,用反阿拉伯风格和形式写出的东西,不是阿拉伯文学。

萨拉迈·穆萨(1888—1958)也是埃及近现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利用创办《未来》(1914)杂志以及参与10多种报刊杂志编辑的工作之便,积极参加文学论争,并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他认为,阿拉伯古代文学多是“国王的文学”和“消遣的文学”,现代文学则应是千百万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斗争的文学。应该建立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用人民语言书写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他指出:“人民是

收稿日期:2004-02-22

作者简介:孟昭毅(1946-),男,天津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切,人民是始与终。”文学家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在他们所写的一切作品中都应体现这一责任。他还认为:“文学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而不是艺术美。人道主义比美更具有永恒性。文学是从整体上,而不是从局部去观照人类的艺术。”^{[1](P414-415)}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在20世纪上半叶,曾引起埃及乃至阿拉伯思想文化界的激烈争论,颇具影响。

埃及现代诗歌流派“笛旺派”的出现,使埃及现代文论得到了发展,“笛旺”(又译“迪万”)是“诗集”一词的音译,“笛旺派”又称为“诗集派”,因该派主将阿卡德(1889—1964)等人写诗以“笛旺”为题而得名。阿卡德主要的文论著作有《书和生活中的阅历》(1924)、《文学艺术审视》(1924)、《象征主义》(1947)、《当代文学问题》(1953)等。他主张诗歌作品应表达作者个人感情,文学是作家内心生活的历史、灵魂的写照。因此,他重视研究作者的特殊性。他在1931年写的《伊本·鲁米》的前言中指出:“不能从其文学中找出他本人独具的个性的文学家,是不值得去研究的。”阿卡德在为马齐尼(1890—1949)于1913年出版的第一版诗集的序中写道:“今天的我们已不是20世纪前的我们。新一代具有东方人的感觉,面对着西方人面对的世界。”^{[2](P1246)}他以“东方人的感觉”指出:“艺术美和人体一样都趋向自由,自由即美”,“美的艺术带来两种享受:自由和有序。”^{[1](P3)}阿卡德提出的这些主张和见解,不仅有个人的认知和思考,而且主要代表了阿拉伯当时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要求。这一流派与海外旅美派遥相呼应,标志着阿拉伯文学新时期的到来。

20世纪20年代以后涌向美洲大陆谋求发展的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阿拉伯作家成立了“笔会”等一些文学社团,他们在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活动,形成颇具特色的“旅美派”作家群和“旅美派”文学。他们不仅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中有诸多成就,而且在文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代表作家主要有纪伯伦和努埃曼等。

纪伯伦(1883—1931)是在世界上有着广泛影响的阿拉伯作家,他的作品被称为“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礼物”。他在艺术上追求爱与美的主旨,在他的艺术性散文《音乐短章》(1905)、散文诗集《泪与笑》(1913)和诗文集《珍趣篇》(1923)等作品里,包含了

他对美学的大量见解。他认为:“美是上帝,是真理。美是爱情的向导,精神的醇酒,心灵的佳肴。”“艺术是从已知世界走向未来世界,从自然走向无穷的一步。”“艺术的精美只有通过风格才能体现出来,风格和思想是一对孪生兄弟。”他提倡:“诗人应有理想、梦想,应让思维有一片高于客观世界的领地,不应做岁月的奴隶,而应迈着坚定步伐走向真理,步入完美。”^{[1](P231)}纪伯伦以他在文论中的睿智与博大赢得生前身后名。

旅美派中堪与纪伯伦相比的文论家是努埃曼(1889—1988)。他的主要文论著作是《筛》(1923)和《在新筛中》(1973)等。他在大量创作实践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他在文学方面创新、改革和反对因循守旧的思想。尤其在《筛》中的理论部分,重点讨论了文学批评的定义、标准和特点等问题,提出了文学批评的任务是认真鉴别作品的优劣和其中的美丑,就像用筛子筛选粮食一样,达到取优去劣的目的。他提出了“创造性批评”的概念,既文学批评家不应满足于跟在文学创作后面,而应超越它,为它引领道路。批评家不仅是“提纯者,估价者,排名者”,更应成为“艺术创造者”,“助产士”和“导师”。^{[2](P1296)}他在这部论著中还提出这样一些观点:文学负有人类的精神使命,应能帮助人认识他自己,认识使他得以前进的力量,文学作品是作者心灵和读者心灵之间的使者,而批评家的力量在于,有能力阐明作品中蕴含的一切积极因素,使作者和读者心灵间产生更好的沟通。“笛旺派”主将阿卡德曾在为《筛》写的序言中指出:“努埃曼革了语言枷锁的命,使人们认识到文学创作中思想、情感是第一位的,语言不过是表达工具;语法词法,不能创造出一个民族,但思想、感情每天都在更新着人类。”^{[2](P1293)}旅美派的观点与笛旺派的主张相呼应,对阿拉伯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

阿拉伯旅美派文学,即过去史书论著中所称叙美派文学,其成员大多是来自于黎巴嫩、叙利亚,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处境,所有这些文学家都称自己为“叙利亚人”,实际上来自黎巴嫩的占大多数,现在再称“叙美派”就很不确切了。从阿拉伯文论角度讲,叙利亚近现代文论的第一人当推古斯塔基·希木绥(1858—1941)。他在1907年出版的文论专著《批评学取饮者之泉》中,大量借鉴古代阿拉伯文

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论述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法则,提出“批评阶梯论”,即“批评必经阐释→分类→判断三阶段。阐释有三个先决条件:(1)澄清和确定被批评对象与文学史的关系;(2)弄清其类别和问世的时间地点,确定隐藏于作者及其作品之间的关系。”(3)“作出‘公正判断’的条件是:批评家应是专门家;不应因个人爱好而毁誉失度;掌握分寸感;勿混淆作品与作者;批评对象是话,而不是说者。只有随着这三个阶梯提高才能达到中肯的批评。”^{[1](P368)}古斯塔基·希木绥堪称是阿拉伯近代全面阐发论述了文学批评本质的第一人,具有开拓性影响。

在近现代阿拉伯文论中,突尼斯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1901年获得“诗坛酋长”称号的诗人穆罕默德·沙兹利·哈兹纳达尔(1879—1954)最先提出改革诗歌的号召。他在《诗之产生与发展》(1919)的讲演中,支持诗歌革新派的主张,提倡诗首先是心灵的声音,因此,诗的主要使命是描写人,写人的感情及人生的一切。为当时的浪漫主义诗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一位突尼斯文论家是著名诗人沙比(1909—1934),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不仅留下著名的诗集《生命之歌》(1955),而且还写有许多有关诗歌的文论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拉伯的诗歌想象》(1929)。这篇讲演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基本观点:“提倡诗歌创作自由,主张创新,反对因袭清规戒律,主张在诗歌中再现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世界。”^{[3](P1512)}在继后的许多文论中,他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和美学理想,对后世阿拉伯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理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突尼斯作家协会主席,当代批评家穆罕默德·姆扎利(1925—)在1969年发表的文论著作《思想启示录》中,集中表达了他对文化和文学的见解。其主要观点是:“建立真正的民族文化和突尼斯文学,此文学应从民族自身深处产生。文学是影响和被影响,是给与取,是和时代、环境、现实的对话、交流和辩论。文学具有崇高使命,关心人类事务,不应怕政治参与,但应区分文学与政治,反对奴隶主义和空洞虚伪。”“对文学的总的要求:体验的真确,观点的新颖,表达的地道,目的的真诚。”^{[1](P348)}穆罕默德·姆

扎利在文论方面的成就推动了突尼斯文学的发展。

在近现代阿拉伯文论中,埃及的文论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阿拉伯文学之柱”赞誉的塔哈·侯赛因(1889—1973)是阿拉伯文学史和文论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位人物之一,其文学批评和文论著作主要有《纪念阿布·阿拉》(1914)、《伊本·赫尔东的社会哲学》(1918)、《星期三漫谈》(三卷,1925、1926、1945)、《论蒙昧时期的诗歌》(1926)、《哈菲兹与邵基》(1929)、《阿拉伯半岛的文学生活》(1935)、《和囚禁的阿布·阿拉在一起》(1935)、《诗歌与散文漫谈》(1938)、《和穆台纳比在一起》(1937)、《埃及文化的前途》(1938)、《文学与批评数章》(1945)、《阿布·阿拉之声》(1945)、《争论与批评》(1955)、《批评与改革》(1956)、《我们的当代文学》(1958)、《阿拉伯文学史研究集》(二卷,1970)、《模仿与革新》(1978)、《书籍与著者》(1980)等专著和文论集。可以说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工作贯穿了塔哈·侯赛因的一生。他的这些著述中深入研究了古代阿拉伯文学遗产的美学价值、代表诗人、作家的历史地位,译介了欧洲现代文艺理论、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提出阿拉伯新文学发展的大趋势。这些个性鲜明、富于创见性和挑战性的观点,形成了塔哈·侯赛因的文论体系。

他在首次震撼文坛的《论蒙昧时代的诗歌》一书中,公开宣称:“科学的研究方法,应是不顾神学和传统的清规戒律而进行的客观评价,研究者所关心的只是科学真理本身,绝无其他。”^{[2](P1317)}在此观点的指导下,他在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归诸于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是后来时期编造的。”^{[4](P61)}他的这些观点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即文学研究要突破宗教偏执的影响和束缚,文学所追求的首先是艺术美,而不是充当神学需要的奴婢。在《诗歌与散文漫谈》一书中,收入他1932年应邀在黎巴嫩所做题为《阿拉伯文学及其在世界几大文学中的地位》的学术演讲。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当时的两种倾向,即有人贬低阿拉伯人的文化遗产和文学传统,也有人以古代文学遗产的保护者自居,他提出:“不应把阿拉伯文学称之为死去的文学,因为它活着,生机勃勃。”“同时,我们也不能低制或拒绝欧洲现代文学。我们从那里汲取营养。”^{[5](P205—206)}他一方面认识到古代阿拉伯

诗歌、史诗、诗剧和散文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指出:“阿拉伯文学具有一种决不亚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奇妙的艺术之美。”同时又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些艺术美未能被充分发现,其原因如果说是“阿拉伯文学的过错,只是人们不去读它,也不去理解它。”^{[5](P207)}另一方面,又指出欧洲现代文学学习的必要性并颇有见地地说:“我们是这样去做的: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好好尝一尝,送进肚里去消化,最后将它消化掉,加以吸收。”^{[5](P210)}塔哈·侯塞因的文论使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确立了新的文艺理论以及新的文学批评标准,对阿拉伯各国现当代文学的迅速崛起,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学史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近现代埃及文坛上,另外一位有影响的文论家是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他是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现当代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文论著作主要有《在思想的阳光下》(1938)、《来自象牙之塔》(1941)、《文学艺术》(1952)、《均衡论》(1955)、《我们的戏剧模式》(1967)、《悟性归来》(1974)、《在思想和艺术之间》(1976)、《生命文学》(1976)等。陶菲格·哈基姆从思想家的立场探讨了文艺的美学本质问题。在《文学艺术》的开篇他就指出:“只有文学才会发现和保存人类和民族永恒的价值,只有文学才会带有并传承民族性和人性觉悟的钥匙……而艺术则是驮着文学在时间与空间驰骋的活跃而有力的骏马。”^{[3](P1481)}在《来自象牙之塔》一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象牙之塔”论。他解释说:“我不要求作家把自己囚禁起来,与世无交,以成为一个思想家,或离群索居,生活在思考的禅房里,而是要求他们与那些他欲与之交流的各色人等进行交往。”“作家经常生活在人们中间,但他又置身于高耸的‘象牙之塔’中,这象牙之塔不是别的什么,只是那颗超越践踏的纯洁的心。他和人们在一起,在泥土中,是以他的身体,而不是他的心。他和他们分享一切,但不分享他们的道德虚弱,思想贫乏。他和人们在一起,为的是了解他们,爱护他们,描摹他们,之后却要引导他们,以使他们有一个榜样。”^{[1](P603)}陶菲格·哈基姆从作家的角度,指出文学与生活的本质关系问题。所谓“象牙之塔”实际是指作家的一种思想境界,一种精神人格,一种写

作状态。他认为作家的使命感在于即使他们来源于人民,也要引导他们登上艺术的大雅之堂,即“不应向人们描写他们那个世界,而应把他们引向他的世界。”

陶菲格·哈基姆还在大量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旨在发展阿拉伯文学艺术语言的主张。由于官方的或正规的阿拉伯标准语和人民大众的日常用语差别很大,影响了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因此,他试图建立“第三种”或“中间”语言,并在剧本《交易》(1956)、《每张嘴都有饭吃》(1963)等作品中进行大胆尝试,其目的在于要找到这样一种语言,它既不与标准规范语的原则相矛盾,为任何角色所使用,又能被阿拉伯国家中任何职业和阶层的人所理解。他认为这种语言可促进说阿拉伯语的人民之间的彼此了解和接近。他的“第三种语言”论既受到一些人的赞许,也有人提出异议。陶菲格·哈基姆的文论还有很多,对埃及和阿拉伯现当代文坛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埃及现代提倡“静悄悄的批评”的文论家是叶海亚·哈基(1905—),他因主张平心静气、隽永涓细的文学批评,反对大喊大叫、金刚怒目式的批评而著名。他主要的文论著作有《批评的步伐》(1961)、《埃及短篇小说的黎明》(1960)和《思而笑——泪而笑》(1966)等。他指出:“文学是知识、鉴赏力升华的结果,与作家个人能力关系极大”。他强调,“作家必须重视人性和人道主义价值,因为艺术把人从兽性和消极状况中拯救出来。”他认为,“文学是不断的创造工程,创造性只能建立在主题和表达上,只有风格精美,文学才能精深、超卓”。^{[1](P668)}这些文论方面的见解使他成为埃及现代著名文论家。

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1911—)在文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他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革命,而不是简单的描绘”。“文学是一种审美活动”。^{[2](P1432)}他创作了大量有悲剧性的社会小说,因为他认为,社会悲剧的深刻性来自于对生活本质的认识,如果可以“解决社会的悲剧也许可以最终解决或减轻生活的悲剧”。^{[6](P2)}面对现实中的危机和悲剧,他认为:“既然生命的终结是束手无策与死亡,那么,它就是一种悲剧。这种悲剧无论是令人伤心哭泣的,还是令人开颜欢笑的,终究是一

种悲剧,甚至对于那些视生命为走向来世之通道的人来说也是一样。”^{[7](P144)} 纳吉布对小说的美学本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认为:“小说是既有事实又有象征、既有观察又有想象的一种文学构成——不能把‘小说’判别为作家所相信的历史事实,因为作家选择这种文学形式,无须保持历史的原貌,他只是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意见。”^{[8](P139)}

纳吉布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提出创作技巧要不断创新。他虽然曾经说过:“欧洲一些新的创作方法也许我们永远学不会。阿拉伯作家固有的文化基因决定他们要选择适当的形式与本土的内容相一致。”^{[9](P767)} 但是,由于他博览群书、通今博古、学贯东西、传承创新、借鉴再造,熔传统与现代于一炉,所以他自豪地说:“通过这些作品,我可以说,自己是烱诸家技巧于一鼎的。我不出于一个作家的门下,也不只用一种技巧。”^{[3](P1492)} 这种被文学史家称为“新现实主义”风格的写作动因是阿拉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只有“描写特定的思想和感觉,以细节为手段”,才能使现实成为表达思想和感情的方法。纳吉布·迈哈福兹的这些论述,使之不愧为阿拉伯

当代文论的一大家。

近现代阿拉伯文论催生了当代阿拉伯文论,促进了阿拉伯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乐黛云. 世界诗学大词典[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
- [2] 高慧勤, 栾文华. 东方现代文学史[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 [3] 季羡林. 东方文学史[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 [4] <美>伦纳德·S·克莱因. 李永彩译. 20 世纪非洲文学[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1.
- [5] 东方文学专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6] 纳吉布·迈哈福兹. 宫间街译者序言[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7] 纳吉布·迈哈福兹. 东方研究[M].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8.
- [8] 纳吉布·迈哈福兹. 为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作证[M].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8.
- [9]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全传[M]. 济南: 明天出版社, 1997.

A General Picture of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and Its Works

MENG Zhao-yi

(College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generally-launched bourgeois reformism movement, Arabic literature made rapid progress. The literature and its works in such Arabic countries as Egypt, Tunis, Lebanon, Syria, Iraq and Iran came to show obvious nationalism appeal. Especially in the Arabic literary world in the 1820s, the literature schools such as "School of Poetry Anthology" in Egypt and "Syrian-American School" composed of by the overseas Lebanese and Syrians in America rose one after another. They not only made numerou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but also put forward instructive theories on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in works, which made an utmost profound and lasting influence on Arabic literature as well as guaranteed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Keywords: Arabic literature works; School of Poetry Anthology; Syrian-American School; Egyptian works

(责任编辑 刘小平)